



理论解读

深化对党性文化的研究

肖纯柏

党性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结晶，具有一系列鲜明特点，凝结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性、先进性，反映了党的独特气质和精神标识，是政党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集中表达，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显著标志。

坚持义务优先

坚持义务优先是党性文化的突出特色。在党员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不同的文化理念。西方很多政党坚持自由第一、权利至上，权利先于义务。而我们党强调党员义务先于党员权利的担当精神，倡导大公无私、先公后私，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这种奉献牺牲精神是党性文化的独特标识。

义务先于权利的文化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这也是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重要体现。在纪律与法律的关系上，我们党强调自律在先、纪律守中、法律托底，这种“三律一体”的差序文化结构，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党员主体地位与组织本位相统一

党员主体地位与组织本位相统一是党性文化的本质特征。共产党人是组织的人，不是孤立的人，组织观念是党员的共同标识。我们党曾长期处于武装斗争和农村环境中，把以农民出身为主的党锻造成为工人阶级政党，这与党秉持个人服从组织的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几百个政党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员恪守铁的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组织本位，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和行动一致。作为党的组织的一员，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包括主要负责人在内的党员干部自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生活，接受党员评议和监督，这是共产党的突出组织优势。

尊重个体权利与维护中央权威相统一

尊重个体权利与维护中央权威相统一是党性文化的核心内涵。正如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和谐大于分裂与冲突一样，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大于差异、和谐重于争论。从组织发展的角度讲，维护党的团结就是维护党的生命。维护党的团结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政治原则，要靠民主集中制来保障，更要靠坚定的政治理想、政治纲领和政治立场来支撑。如来说和而不同、活而有序犹如党组织的文化基因，那么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则好比党员的党性风骨，共产党员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党的团结，以思想上的统一保障政治上的团

结和行动上的一致。

以文化人、以义制利

以文化人、以义制利是党性文化的风骨气韵。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追求。物质让党壮大，制度让党强大，精神让党伟大。我们党由小到大、攻坚克难，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劳而不怨、欲而不贪。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更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珍视名节、淡泊名利的人，越是生活改善，越是发展市场经济，越要树立科学的利益观、财富观和生活观，注重精神生活和心灵生活，追求“革命理想高于天”，以义为利、舍利为义的精神境界。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既要增强执政意识，也要增强党的意识。增强执政意识，关键在把握执政规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执政根基，维护执政安全；增强党的意识，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党员要以身许党、以身作则。我们不仅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而且讲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精神。追求共产主义是党的历史制高点，也是党的道德制高点。

从三个结合上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

张西立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科学认识和把握与世界深度融合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同样需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加以审视。

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看

弱国无外交。历史无情地证明，相应的国家实力始终是国际交往的“硬道理”。昔日，汉唐雄风威震宇内，是和当时的“盛世”直接关联的。蒙元帝国横跨亚欧大陆，深刻改变了世界版图和历史走向，是和它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以及组织体系相联系的。大明王朝尽管内部积弊丛生，但直到中后期其经济实力依然独步世界前列（拥有当时世界白银总量的2/3）。直到明清时期，统治阶级面对蓬勃而来的西方工业革命浪潮自封，不思革新图变，终于难免“落日的辉煌”，陷入“落后就要挨打”、以至“开除球籍”的绝境。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力倡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梦，其其实就是百年来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矢志追求的根本目标。这其中，“国家富强”是基础、前提和根本，它为民族独立以及全体人民的各项基本权益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物质、制度和价值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强起来”，是指包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到对外交往等方方面面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跃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走向世界、重返全球舞台中央的壮阔进程中，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描绘出了壮美的图画。这其中彰显的不仅是强大的工业制造体系、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屡屡弯道超车的高新科技、无与伦比的进出口能力、深广的消费市场等“硬实力”，而且更有依托这些“硬实力”、承载和体现中国气度、中国风格和中国价值的中国

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故事等“软实力”。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来，满怀历史悲情的中华民族自有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立足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积淀，秉持刚健有为、吸纳包容的开放进取姿态，亿万中国人民沿着符合本国国情、反映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不仅在物质文明上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已经并且必将在精神文明上迎来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在批判性继承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缔造出更加先进的新文明形态。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曾几何时，舆论界有这样一种声音，即认为伴随中国自身体量的增大，对世界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面对国际格局大调整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三峡”，我们应推出更加具有解释力、感召力和引领力的对内对外战略。纵观当下世情，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以美苏两极争霸全球为主调的冷战结束以后，以9·11事件为标志，长期作为世界主导力量的西方世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日趋乱象纷呈，西方国家治理之乱暴露出其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治理的深层危机。全球范围内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未来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充满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意愿依然强劲，特别是随着奉行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力量的茁壮成长，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客观上也给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该履行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为有效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方案”，提出了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和历史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更好地发展自身，着眼推进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深刻洞察世界大势、准确把握自身情况，在继承和弘扬既有外交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理念，带头构筑“亚投行”，力倡“一带一路”建设，主持推进“金砖国家会议”等，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从

而构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基点，等等。凡此种种，可以说，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核心和灵魂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博弈的“伟大斗争”的产物，也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认识工具洞悉国际政治走向、认识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理论结晶，为新时期新阶段维护和发展我国核心利益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从根本上破解“国强必霸”、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开具了体现“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

从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看

“万物一体”是人类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思想。人类不同文明形态发生发展、交流融合的历程表明，坚持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处事原则，正是全球化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氤氲共生、和平共进的内在呼唤。自从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崛起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的确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但不论是从理论逻辑上还是实际情况上看，“世界历史”并不是由西方人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随意涂抹和刻意装扮的小姑娘，它既无法抹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文明国家历史上带给当时世界的影响和改变，更不可能一厢情愿地主观判定历史已经终结于西式“自由民主”制度。

“世界历史”究竟是如何演进而来，以及未来的“世界历史”又将如何演进，国际国内早有不少具有良知的学者冲破“西方中心论”的枷锁，从不同侧面给予了深刻揭示和阐发。这其中，重头是对于秦汉以来的中华文明在不同时期尤其是中古以后从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观念上带给“西方”的巨大历史影响。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没有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等渠道对于近东乃至欧洲的深广传播，根本就不会有激发资本主义勃兴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这样讲，目的在于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希望更多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然而极易被忽略的事实，即“世界历史”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不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文明体长期共同参与、深刻相互作用的客观历史进程。

百年来，中国通过自身的艰辛努

中国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胜利

——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

李 鹏

了，马克思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作出精确设计，甚至个别阐述和论断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28年前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委政府要用好政治经济学”“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原因何在呢？

多年来，在许多人，包括专业人士的思想中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以《资本论》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剥削理论和阶级斗争

观点是其理论核心，无非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并最终走向灭亡，因此，它是批判的经济学，而非建设的经济学。确实，当代世界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仍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尖锐地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剥削。但是，由于大多数人从未真正研读甚至没有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通过联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暴力和盘剥成长史来学习和认识《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原著，因而学习者无法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原意和本意，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错误和歪曲式误读。

认识理解和运用《资本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导价值，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之意。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

律”，恩格斯也曾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二者的矛盾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在对生产力研究的同时，突出强调揭批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关系上的剥削性质和必然灭亡的趋势，是有着具体的历史情境的。回顾世界历史，我们或许对此更容易认识和理解。

经历二战后，国际竞争已经从国家战争的热性手段转变为两种制度的冷战博弈。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积贫积弱，其强烈的发展意愿不仅得不到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那是一厢情愿），而且无一例外地面临民族独立后的国家生存难题。一方面，这些国家建立过程的革命手段，让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思想和心理的恐惧症，只有除之才能后快，因此无所不用其极，意识形态、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种攻击乃至肮脏手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备受掠夺和欺压的前殖民地社会主义国家，好不容易翻身得到解放，只有全民团结和动员才可能保护胜利的成果。由于在经济实力上资强社弱，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自主选择了走上经济计划、政治集中的发展制度和道路。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愿望被裹挟入两大阵营之争，受到美苏霸权主义的排挤和压制，中国不得不同时准备与美苏在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多场竞争及防范潜在可能的战争。因此，经济集中成为当时国家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承担起了应有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规律，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壮大了非公有制经济，

马克思1843年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历经24年呕心沥血，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至1890年，《资本论》第一卷又历经23年修改完善的漫长过程，相继出版了德文第2版、法文版、德文第3版、英文版、德文第4版5个版本。《资本论》第一卷集中代表了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性贡献，即两大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密切的结合、最充分和最系统的阐述。《资本论》第一卷的正式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立，是人类思想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出版后，马克思在有生之年没能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革命理想变成现实，但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困难和挫折中艰难前行，依然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同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制度也发生了较多变化。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同时也随着时代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需求和挑战。时间的演变、时代的变迁只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具体形式，而没有改变规律本身。但无论时代如何改变，《资本论》所阐明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仍然显示并将继续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是行不通的。历史决定

既发挥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优越性，又拓展利用了市场经济的特色长处，逐步探索出适应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制度和政策，现正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这些不可谓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如果按照当年西方之改革发展路径，先行打造西方式制度，今日不仅无法出现西方现代成果，眼前之果实恐也难得到。

进一步遍观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现状，可以看到：除了早期老牌发达国家仍旧维持世界经济领先水平之外，绝大部分二战后的新兴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要么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踏步不前、发展缓慢甚至成为失败国家，其令人失望程度，连那些实力雄厚的前宗主国家也渐次退出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支持。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成就突显，上述苦于改革无路、发展缺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转向与中国大规模、深层次의广泛交流合作。这个过程既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被世界开始接受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从国内走向国际合作进程，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的成功范例，这不可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专家视点